

哲学生物学、生命现象学 与“生命与心智的深度连续性”

朱耀平

(苏州大学 哲学系,江苏 苏州 215021)

[摘 要] 生命与心智的连续性有“弱连续性”与“强连续性”之分。前者强调的是“心智的生命性”,即“心智与生命的内在关联性”,认为应该把心智看成一个有生命的、对世界起构造作用的具身主体,把认知看成生命系统适应环境、为自己构造一个有意义的周围世界的过程。后者又被称为“生命与心智的深度连续性”,它关心的是“生命的心智性”,而非“心智的生命性”。瓦雷拉等人的自创生理论和约纳斯的生命现象学不约而同地都把生命系统的形式统一性、开放性、自主性和目的性等本质特性看作“生命的心智性”或“生命与心智的深度连续性”的集中表现。

[关键词] 瓦雷拉;约纳斯;自创生;新陈代谢;生命与心智的连续性

[中图分类号] N0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99(2026)03-0001-11

从逻辑上来说,“生命与心智的连续性”这个命题可以被看成由“生命的心智性”与“心智的生命性”等两个子命题构成的一个合取命题。在这两个子命题中,长期以来得到较多关注的是“心智的生命性”的问题。近年来为人们所熟知的“具身心智说”强调认知不是发生在大脑中的信息处理过程,而是生命系统(具身主体)与环境的适应性的动态关联。因此,这是一个“认知的具身性”和“心智的生命性”得到越来越充分的揭示的过程。不少学者认为这种看法主张的是生命与心智的“弱连续性”。与此不同的是,生命与心智的“强连续性”或“深度连续性”论题则着眼于“生命的心智性”,认为“生命与心智在逻辑上是等价的,即生命是心智的充分必要条件”^①。简而言之,“生命与心智的深度连续性”论题强调的是——生命即心智、生存即认知。

众所周知,由胡塞尔(Edmund Husserl)开创的现象学对意识或心智的认识同样经历了一个重新塑造心智与身体的内在关联性的过程。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rt)是这个重塑过程的关键性人物,其《行为的结构》、《知觉现象学》等著作的基本主题就是“心智存在于身体中”。就人而言,并不是“我有一个身体”,而是“我就是我的身体”。^② 我的心智与我的活生生的身体是不可分的。对于其他的动物甚至更低等的生物而言,它们的灵魂同样不是作为精神实体存在。此外,它们也不是像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认为的那样作为“表象者”被动地接受外界的刺激而表征一个在它们之外独立存在的自在世界。当代认知科学的具身生成论与梅洛-庞蒂的具身感知现象学的共同主张在于,认知发生在身体与环境的相互成就中,即心智像生命、有机体一样无法离开与

[收稿日期] 2025-10-15

[作者简介] 朱耀平(1968—),男,福建武平人,哲学博士,苏州大学哲学系教授。

① 李恒威、肖云龙:《论生命与心智的连续性》,《中国社会科学》2016 年第 4 期,第 38 页。

② “我有一个身体”意味着“我”在拥有身体之前已经作为无形体的主体存在,“我就是我的身体”则认为“我的身体”是唯一的主体,除此之外不再有任何虚无缥缈的东西存在。

环境的相互作用独立存在,因此不应该把心智看成一个笛卡尔式的精神实体或信息处理机器,而应该把心智看成一个有生命的、对世界起构造作用的具身主体。本文第一部分将通过对当代认知科学的发展过程的回顾,展现心智及其认知活动的作为生命活动的一个内在环节的本质逐步显现出来的过程。

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认知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在“心智的生命性”(即“生命与心智的弱连续性”)得到比较充分的揭示的同时,“生命的心智性”(即“生命与心智的强连续性或深度连续性”)问题也逐渐成为包括哲学生物学、生命现象学在内的众多学科领域的学者们高度关注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瓦雷拉(F. J. Varela)等人的自创生理理论和约纳斯(Hans Jonas)的新陈代谢现象学不仅各自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还呈现出殊途同归的趋势。本文将通过对这两种理论学说的剖析和比较,深入探索破解生命与心智的深度连续性难题的生命哲学之路。

一、作为生命活动的一个内在环节的具身心智及认知

20世纪中叶以来认知科学的发展所达到的最后成果在于,认知不再被看作是发生在大脑中的信息处理过程,而被理解为生命系统(具身主体)与环境的适应性的动态关联。要真正理解这一点,恐怕还得从心智哲学及认知科学所经历的演变过程说起。

根据伊文·汤普森(Evan Thompson)等人的看法,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认知科学主要经历了认知主义(Cognitivism)、联结主义(Connectionism)、具身动力论(Embodied Dynamicism)等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①

认知主义是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认知科学的经典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的大脑像计算机那样是一个符号操作机器,认知就是遵循数字计算机模式的信息处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非符号性的感觉输入首先被转换为符号表征,随后大脑通过对这些符号表征进行纯粹形式化或句法化的操作输出问题的解决方案。

认知主义打破了行为主义心理学“不涉及有机体的内在状态”的藩篱。在20世纪70和80年代,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蓬勃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下,认知主义倡导的“心智的计算机模型”成为一种广受欢迎、富有成效的学术传统。^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相关研究的深入推进,这一模型在理论上的严重缺陷也逐步暴露出来。

认知主义的第一个缺陷在于它没有消除在第三人称的计算活动与第一人称的主观心理体验之间的“解释性鸿沟”^③。在认知主义看来,真正承载意识活动的,是无意识的、局限于颅界内的符号操作,它发生在大脑独立的中枢认知模块中。心智由此被分割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主体可感知的第一人称的意识体验与大脑执行的第三人称的符号计算,二者处于笛卡尔式的二元对立之中。

认知主义的另外一个缺陷在于,它将本质上属于社会文化活动的“人类计算行为”,错误地投射到个体大脑的内部运作中。^④ 认知主义没有看到,人类计算行为是具身的,需要感知与动作系统的

① 关于认知科学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发展轨迹,汤普森在《生命中的心智》的第一章进行了简要而深入的说明。参见 Evan Thompson, *Mind in Life: Biology, Phenomenology and the Sciences of Mi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② Jerry A. Fodor, *The Modularity of Mind*, MIT Press/A Bradford Book, 1983, p. 38.

③ Joseph Levine, *Materialism and Qualia: The Explanatory Gap*, Pacific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Vol. 64, 1983, pp. 354-361.

④ Evan Thompson, *Mind in Life: Biology, Phenomenology and the Sciences of Mi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7.

参与；它根植于由“符号认知与技术”构成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其边界并不止于颅骨或皮肤，而是延伸到环境之中。当图灵提出图灵机的概念时，他剥离了数学家进行计算时所处的具体世界，以及他们执行运算时运用的心理过程。然而，认为图灵机的概念因此捕捉到了人类个体内部智能思维或认知的本质内核，不过是认知主义的“创世神话”^①而已。而摆脱这一神话造成的幻觉的关键则在于认清下列这个事实：“真实的人类计算行为——即抽象计算概念的原型——从来不是纯粹的内在心理过程，它始终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换言之，计算反映的从来不只是个体的认知属性，而是个体所处的社会文化系统的特性。”^②把通过对复杂的计算行为的抽象得到的社会文化系统的本质框架看作是个体认知的模型，无异于削足适履。

联结主义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主张将心智视为“神经网络”，而不是“颅内计算机”。具体来说，联结主义通过构建由人工神经网络组成的计算模型，证明信息处理完全可以通过“神经单元间连接权重的动态调整”来实现，这种模式更接近生物神经系统的实际运作方式。可见，“联结主义”所谓的“联结”指的是“神经单元之间的连接或联结”。

必须指出的是，联结主义相对于认知主义的进步和突破可能并不像它的倡导者所相信的那么大。首先，虽然联结主义更具神经生物学的合理性，但它仍然延续了认知主义将认知抽象化为“可形式化计算过程”的核心理念；其次，联结主义对认知主义的批判始终停留在认知科学内部范式竞争的层面，并未触及后者将社会文化实践错误内在化这一重要的理论缺陷；最后，就解释鸿沟问题而言，联结主义虽拓展了计算心智的范畴，却几乎未为解决计算心智与现象心智之间的割裂提供新思路，“主观体验依旧被排除在心智科学之外，那道横亘在客观计算与主观体验之间的解释鸿沟依然未被弥合。”^③

更加重要的是，认知主义和联结主义都未质疑认知过程与现实世界的本质关联，致使它们的心智模型沦为脱离具身性的抽象存在。一方面，二者将认知过程定位于大脑中的计算，却未深入思考这种定位如何与大脑的生物学事实、有机体活生生的身体以及环境之间的关系相协调；另一方面，它们假定心智与世界的关系本质上是抽象表征——大脑中的符号或数据，对应着某个预先独立设定的外部领域事态。这种框架将心智与世界视为彼此割裂的独立存在，外部世界仅作为颅内表征模型的映射对象而存在。

具身动力论兴起于 20 世纪 90 年代。它的核心隐喻是“作为世界中的具身动力系统的心智”，而非“作为颅内神经网络(或计算机)的心智”。这种范式转换将认知锚定在生物体与环境的实时互动中，强调认知既非纯粹的内在计算，也非静态的抽象表征，而是有机体为维持生存而进行的适应性调控的过程。在对认知过程的本质的理解上，具身动力论所取得的突破主要体现在它对认知过程的“动态性”和“具身性”的深刻认识上：

首先，输入被视作对系统内在动力学的扰动而非待执行的指令，内部状态则被理解为扰动触发的自组织调节，而非对外部事态的表征。这种非表征主义的进路彻底颠覆了认知主义和联结主义“计算表征”的范式，将认知重新定义为具身系统在与环境的互动中涌现的动态平衡过程。

其次，认知不是发生在大脑中的信息处理过程，而是具身主体在具体情境中拥有的熟练技能性

^① Evan Thompson, *Mind in Life: Biology, Phenomenology and the Sciences of Mi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8.

^② *Id.*

^③ *Id.*, 10.

知识^①。认知由此被重新定义为:生命体为维持自身存续而与环境展开的适应性互动,它在本质上是具身主体“在世界之中存在”的方式,而非对外部世界的内部表征。

这两方面认识的交汇形成了一种革命性认知观:认知行为产生于“具身主体与环境的动态耦合”,而非颅内抽象计算。这种框架彻底打破了认知主义和联结主义“离身心智”的桎梏,为弥合计算心智与现象心智的鸿沟提供了新范式。所谓的“4E”路线——Embodied(具身性)、Enactive(生成性)、Embedded(嵌入性)、Extended(延展性)——成为理解认知和心智的本质的基本策略。^②

综上所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认知科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认知主义和联结主义最终被具身动力论取代的过程。这个演变过程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在于,与其把认知理解为囿于大脑的计算机或神经网络,不如把它理解为生命系统(具身主体)与环境的适应性的动态的感觉-运动循环。可见,认知科学的发展过程是心智及其认知活动的作为生命活动的一个内在环节的本质逐步显现出来的过程。如果我们把心智及其认知活动看成可以离开一定的生命系统独立存在的实体和过程,那将是对心智和本质的莫大误解。

具身动力论强调心智是生命活动的一个内在环节,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心智与生命的内在关联性。但它既没有把生命作为心智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没有把生命作为心智的充分条件。因此,对于具身动力论来说,生命与心智的连续性是一种弱连续性。而瓦雷拉和约纳斯等人的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生命与心智的深度连续性理论,也正是因为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生命看成心智的充分条件——生命即心智、生存即认知。

二、瓦雷拉等人哲学生物学的自创生理论对生命与心智的深度连续性的探索

如前所述,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认知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在“心智的生命性”得到比较充分的揭示的同时,“生命的心智性”问题也逐渐成为人们高度关注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瓦雷拉等人的自创生理论和约纳斯的新陈代谢理论起着特别引人注目的推动作用。

1973年,智利学者马图拉纳(Humberto Maturana)和瓦雷拉合著的《自创生:生命的结构》一书^③问世,标志着自创生理论的正式登场。“自创生(Autopoiesis)”一词源自希腊语的“auto(自主)”和“poiesis(创造、生产)”。所谓自创生系统指的是该系统能够通过自身的运作和内部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持续地生产并维持自身作为统一整体存在的边界和内部组织。

自创生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细胞这个地球上最小的生命系统的运作过程进行深入的分子生物学考察的结果。作为一个自创生系统,细胞的运作过程具有的特别之处首先在于,细胞作为一个代谢系统通过持续地进行着的化学反应合成的产物本身(蛋白质、核酸、脂质、多糖等大分子)重又构成代谢系统和细胞的整体结构的关键成分,这些成分在后续的代谢反应中发挥着各不相同的作用。

在细胞作为一个自创生系统存在的过程中,细胞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膜界定了细胞作为一个独立实体存在的空间范围,所有以化学反应的形式进行的代谢过程在空间上被限制在由

^① Francisco J. Varela, Evan Thompson & Eleanor Rosch, *Embodied Mind: Cognitive Science and Human Experience*, MIT Press, 1991.

^② Albert Newen, Leon De Bruin & Shaun Gallagher, *The Oxford Handbook of 4E Cogn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③ 该著与他们合著的另一部著作《认知生物学》(1970)合并为《自创生与认知——生命的实现》一书,于1980年出版,详见:Humberto R. Maturana & Francisco J. Varela, *Autopoiesis and Cognitio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Living*,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0.

膜界定的区域内,使得细胞作为一个物理上可区分的、具有自主性的统一体存在;其次,膜的半透性结构是细胞得以成为既有组织闭合性又能与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在这个过程中,某些分子通过细胞膜被吸收并参与细胞内部的化学合成过程,而其他分子则作为废物被排出——的热力学开放系统的关键。总之,膜一方面对细胞的代谢系统的运作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另一方面,膜本身又是由代谢系统持续地合成的脂质和蛋白质等成分来维持和修复的。这就是说,膜既是细胞的代谢系统运作的必要条件,又是代谢系统的产物。换言之,没有细胞膜这个边界,就无法界定细胞的存在,而这个边界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细胞自己创造和维持的,这是细胞这个最小生命系统的自创生特性的另外一个突出表现。

基于对自创生系统的运作过程的以上分析,瓦雷拉认为,一个系统要成为自创生系统必须同时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性:第一,边界性——系统必须具有半透性边界;第二,循环依存性——系统内部发生的反应过程必须能够再生系统的边界和内部组织。

由于以细胞为代表的一切生命系统都是自创生系统,因此,是否具备边界性和循环依存性不仅是判断一个系统是否为自创生系统的标准,同时也是判断一个系统是不是一个生命系统的“操作性标准”。举例来说,根据这个标准,细菌和变形虫(真核生物)都是自创生系统,因而也都是生命系统。而病毒则不然,虽然它常被看作是微生物,但它实际上不符合前面提到的两个标准,因此不是一个独立的生命系统。具体来说,病毒的蛋白质外壳固然满足自创生系统对边界的要求,但病毒的组成成分是在宿主细胞内而非病毒自身之内生成的。这意味着病毒缺乏自主代谢的能力,无法实现自创生意义上的自我维持,因此不是一个作为生命系统存在的微生物。

总之,作为最小的生命组织,细胞的特点在于它能够通过与环境的物质和能量交换独立自主地产生它自身的存续的条件,因此被称为自创生系统。把生命系统看成一个自创生系统,大大加深了我们对生命系统作为一个自我创造、自我界定、自我维持的动态过程所具有的以下几个方面的本质特性的认识:

(一)个体性

自创生系统的边界性为我们理解生命系统的个体性提供了一个恰当的切入点。作为一个自创生系统,生命系统通过产生一个半透性边界或外壳内在地个体化自身,从而将自己与环境区分开来,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以细胞为例,细胞之所以能够从分子汤中脱颖而出,成为具有自主性的个体,就是因为它通过自我产生、自我维持的细胞膜将自己与环境区分开来。正如汤普森在《生命中的心智》一书中指出的,“关键在于,膜结构不仅是反应过程的容器,更是该反应过程持续进行的产物,这一特性对于将自创生系统定义为自主个体具有决定性意义。”^①

(二)开放性

个体性的实质是生命系统的组织闭合性。但生命系统在组织运作上的闭合性并不意味着它在物理空间上的封闭性。作为一个自创生系统,生物体能够通过自我产生的边界将自身与环境区分开来,但这种区分“只是组织层面上的闭合,而非物理上的隔绝”^②。仍以细胞为例,作为细胞的半透性边界,细胞膜既是阻碍细胞与环境间的自由扩散的屏障,又允许物质与能量通过半透膜进行交

^① Evan Thompson, *Mind in Life: Biology, Phenomenology and the Sciences of Mi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05.

^② Juan Diego Bogotá, *Life, Sense-Making, and Subjectivity. Why the Enactive Conception of Life and Mind Requires Phenomenology*, Synthese, Vol. 204, 2024, p. 4.

换,从而使细胞保持为一个远离平衡态的热力学开放系统。

(三)自主性

生命系统的自主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有机体对环境的适应和调节不会从环境方面发生,而只能基于有机体对自己的存续的“关心”而发生,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是“不对称的”^①。其次,生命系统调节其与环境互动的方式并非是任意的,这种调节行为的目标是将自身保存在生存界限之内。“只有当生命系统的行为始终指向其自我维持和延续时,我们才能将其视为适应性的和控制的。”^②以细菌的趋化性为例,细菌会沿着葡萄糖的梯度游动,这是因为葡萄糖提供了其自我维持和延续所需要的营养。同样,细菌会远离环境中达到一定浓度的苯酚,这是因为苯酚是一种会导致其分解的毒物。再次,规范性。生命系统的主动适应性行为必须被理解为规范性的。因为当有机体在环境中进行自主适应性行为时,它遵循的是瓦雷拉和韦伯所称的“所有价值的母价值”,即有机体对其自身的持续存在的“肯定”。^③如果说细菌趋向营养物质或躲避毒素的行为,是对“好与坏”的最原始区分^④,那么这种区分正是基于生命体对自身的持续存在的“肯定”这个“母价值”进行的。

(四)主体性

当生命系统作为个体和自主实体出现,并能阻止自身的分解时,它不仅实现了自身与环境的区分,而且通过将自身的“善”带入世界,在与环境的结构耦合中、在与世界的动态共现中成为“自我极”或“主体”,而世界则从中立的场所转化为始终与生命有机体具有意义关联的“周遭世界”(Umwelt)^⑤。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命始终具有严格意义上的主体性特征。”^⑥

生命系统的主体性集中体现在它的“意义建构”的作用上。如果有机体是具有内在目的性的自我关切的个体,那么将其与环境的互动理解为“意义建构”便顺理成章。^⑦ 对于一个自我关切的的存在者而言,环境之所以成为‘世界’,正是因为环境结构因其与该存在者的持续生存的相关性而获得了意义。^⑧ 意义建构并非字面意义上的“世界创造”,而是重要性与意义的涌现。一个自我关切的细菌能够主动游向葡萄糖浓度较高的区域——正是通过这种意义建构行为,葡萄糖才被赋予重要性。若细菌不是以某种方式关切自身的存在的主体,便不会产生此类行为。正如瓦雷拉在谈到这一点时指出的:“在蔗糖梯度中游动的细菌可以方便地通过蔗糖对膜通透性、介质粘度、鞭毛拍打的水力学等局部影响进行分析。然而,蔗糖梯度和鞭毛拍打之所以有趣,仅仅是因为整个细菌将这些项目视为相关:它们作为进食行为组成部分的特定意义只有在细菌作为一个整体存在和拥有相应的视角的情况下才可能。移除细菌作为一个单位,梯度和水力学特性之间的所有相关性就变成了

① Juan Diego Bogotá, *Life, Sense-Making, and Subjectivity. Why the Enactive Conception of Life and Mind Requires Phenomenology*, Synthese, Vol. 204, 2024, p. 4.

② *Id.*

③ Andreas Weber & Francisco J. Varela, *Life after Kant: Natural Purposes and the Autopoietic Foundations of Biological Individuality*, 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Vol. 1, No. 2, 2002, p. 111.

④ Mirko Prokop, *Hans Jonas and the Phenomenological Continuity of Life and Mind*, 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Vol. 23, No. 2, 2024, pp. 349-374.

⑤ Renaud Barbaras, *Introduction to a Phenomenology of Life*,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21, p. 101.

⑥ Andreas Weber & Francisco J. Varela, *supra* note ③, 118.

⑦ Mirko Prokop, *supra* note ④.

⑧ Ezequiel Di Paolo, *Autopoiesis, Adaptivity, Teleology, Agency*, 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Vol. 4, No. 4, 2005, pp. 429-452.

环境化学定律,对我们作为观察者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但没有任何特殊意义。”^①简言之,蔗糖作为细菌的营养成分的生物学意义是基于细菌作为自我关切的主体所拥有的自创生视角产生的。

不难看出,生命有机体生活在它基于其自身的视角为自己建构的意义世界中。由于有机体的自主性或主体性,其环境或生态位相具有超过物理化学世界的“意义盈余”^②。有机体的生存,即意义生成的过程,即价值和意义涌现出来的过程。由此,环境成为具有效价的场域,其中存在着吸引与排斥、趋近或逃避的对象。

以上所述很大程度上证明生命的生存活动本身就是意义生成过程,就是认知,从而为具身动力论强调认知发生在主体与环境的动态共现中的主张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心智之为心智,在于其认知能力和作用;而认知之为认知,在于意义的涌现。这意味着,生命适应环境、维持生存的过程,即是意义涌现的过程,亦即认知过程。生存即认知,反之亦然。可见,“生命的心智性”可以说是自创生理论必然得出的结论。^③

三、约纳斯生命现象学的新陈代谢理论对生命与心智的内在统一性的揭示

在约纳斯那里,新陈代谢被看作生命有机体的定义性特征,即将生命秩序与物理自然的机械秩序区分开来的东西,这与马拉图纳和瓦雷拉把自创生看作生命系统与非生命系统的本质区别的做法类似。

约纳斯认为,从对生命有机体的新陈代谢过程的系统分析中,我们可以首先推导出它所具有的重要特性:有机体与组成它的物质成分处于“既需要又自由”的关系中。新陈代谢非凡之处在于,它在自然界中引入了一种不同于无生命物质的静态同一性的动态同一性,它表明有机体具有与物质粒子截然不同的存在方式。物质粒子只是“是其所是”,直接与自身同一而无需通过行动维持这种同一性,而代谢系统只能通过“不保持相同物质”而存在。换言之,新陈代谢使有机体始终处于物质流动的状态:“从物质角度看,有机体从未保持相同的物质构成,而正是通过不保持相同物质这一点,它才确切维持着自身的同一性;倘若有机体与其物质构成的总和完全相同,那便是它的生命终止之时。”^④约纳斯将这种通过新陈代谢构成的同一性称为形式同一性,这种形式同一性表明有机体拥有对于物质组成成分的独立和自由;然而,这种独立和自由并不意味着有机体不需要物质,而恰恰表明它存在于物质的不断变化中,它需要通过不断变化的物质维持自己的生存。没有通过新陈代谢实现的物质交换,有机体就会死亡。因此,生命具有一种特殊的辩证性,它与物质处于“既需要又自由”的关系中。^⑤生命体能够在物质内容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保持自己的同一性,同时,对物质内容的更新又是它为了保持自己的同一性不得不完成的任务。它的“能够”是一种“必须”^⑥——它能够在物质内容的变化中保持其形式的不变性,它不随其物质内容的改变而改变;同时,如果它想要维持自己的存在,就不得不更新其物质内容。因此,生命体的形式既拥有对它在任一时刻所占有的物质材料的独立性,同时这种独立性又正是在生命体的物质材料持续不断的更新中实现的。

^① Francisco J. Varela, *Patterns of Life: Intertwining Identity and Cognition*, Brain and Cognition, Vol. 34, No. 1, pp. 72-87.

^② Francisco J. Varela, *Organism: A Meshwork of Selfless Selves*, in Alfred I. Tauber ed., *Organism and the Origins of Self*,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1.

^③ 李恒威:《心智的生命观与后人类社会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21页。

^④ Hans Jonas, *The Phenomenon of Life: Toward a Philosophical Biology*,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76.

^⑤ *Id.*, 80.

^⑥ *Id.*, 83.

它的自由是被“生存需要”乃至“匮乏”的阴云笼罩着的自由。

形式同一性是我们可以从对新陈代谢的分析中得到的“形态学事实”,这个事实并不解释,而是显现某种运作于形式背后并主动维系其同一性的内在一性或主观性。换句话说,唯有预设某种被植入有机体的“内在一性”(能动自我),我们才能理解新陈代谢流变中的形式连续性,以及有机体以维持自身存在条件为根本目的的自我导向行动的可能性。用约纳斯本人的话来说,“正是通过这种内在一性的植入,新陈代谢的连续性这一单纯形态学事实,才能被理解为一种持续不断的行动,换言之,连续性被理解为自我延续。”^①反之,若不预设代谢过程中存在着自我生产的、主动的同一性(能动自我),我们将无法理解生命体的新陈代谢活动模式的可能性。

生命体的出现意味着它将自身与它物区别开来、对立起来,即将自己从周围事物中孤立出来,但“恰恰在生命体的自我孤立中产生出与孤立完全相反的东西”^②,即它对与外在之物的相遇所持的开放态度。与这种态度相对应,外部世界一开始就作为生命体存在的基本环境存在着。必须看到,这种向一个环境的开放,这种空间上的自我超越,植根于生命体的形式对于质料的超越性。这种超越性使它一开始就不停留在它当下占有的物质组合物之中而朝向它所需要的外在材料,这些材料是它维持其生存所需要并在潜在的意义上为它所拥有的物质。可见,正是基于生命体的形式对于其质料的超越性,“一个共-实在的视域因生命的生存需要的超越性被开启出来,生命体的内在一性的狭小区域扩展为一个包括一切与生命体的潜在的生存需要有关的东西的空间范围。”^③换言之,“生命以拥有一个世界的方式所表现出来的自我超越性,以及它走向一个更高级、更完善的阶段的可能性,是从内在于生命体的自由与必然的二律背反中产生的。”^④

生命体的开放性和超越性意味着在它的活动范围内的一切对象都“沾染”了该生命体的“自我”的气息,不管这种气息是如何微弱。根据维持代谢所需要的物质的不同,有机体会趋近某些事物,对某些事物无动于衷,并回避其他事物。必须引入内在性或主观性才能解释有机体与环境的上述这种“选择性关联”^⑤。只有当有机体表现出对感受的开放性及对其自身的存在和延续的终极关切时,只有当它与环境的相遇具有某种体验性质时,我们才能理解它为何主动选择某些行为而非其他。因此,必须看到的是,生命体的超越性是建立在它的内在性和主观性的基础之上的,“无论我们把这种内在性称为对外界刺激的反应,还是对外在对象的渴望或冲动,其中总是包含着一定程度(即使是无限小)的意识——这种意识寄托着生命体对自己的存在和延续的最高关切。”^⑥生命体的内在性和主观性、它对自我保存和延续的关心是它在与外界事物打交道的过程中能够感到高兴或沮丧的先决条件。对一个关心自我保存的生命体来说,它周围的事物是作为彼此有别、具有不同的生存论意义的对象被给予的,而不是混而为一的,这也正是它会根据它自身的生存需要及其轻重缓急对周围事物进行评估和取舍的根本原因。

一方面,唯有通过把内在一性(能动自我)设定为原因和根据,新陈代谢才可能被构想为生命体的存在模式;另一方面,对代谢系统的内在一性(能动自我)的设定无法直接从新陈代谢中导出,而是理解新陈代谢的存在方式如何可能的必要前提。实际上,唯有通过自身作为有机体存在的

① Hans Jonas, *The Phenomenon of Life: Toward a Philosophical Biology*,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82.

② *Id.*, 85.

③ *Id.*, 84.

④ *Id.*

⑤ *Id.*

⑥ *Id.*

亲身体验,我们才能将内在同一性(能动自我)认知为实在的、使新陈代谢成为可能的前提条件。对于无形体的观察者而言,生命是难以理解的。生命的观察者必须由生命作好准备。“只有生命能够理解生命。”^①与无形的“上帝”相比,拥有身体或作为身体存在的人类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人类已经由我们通过或作为活生生的身体存在于世的事实作好了理解生命有机体的本质特性的准备。每个生命体都因受到某个“主宰者”的支配而成为具有内在统一性的个体,这对拥有身体或作为身体存在的我们来说是不言而喻的。

以上所述表明,对约纳斯而言,生物体的内在性首先表现为它对环境事件的敏感性与接受性,例如,为了解释蜥蜴因被戳刺而逃跑的目的性行为,必须预设蜥蜴对外界刺激具有敏感性。但仅凭敏感性还无法完全解释蜥蜴为何逃跑,我们还必须预设蜥蜴具有维持自身延续的内在倾向和自我中心关切。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感受性与目的性活动的关联。总而言之,内在性隐含的自我中心关切、自我概念是解释有机体的目的性活动的必要条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即使对于最简单的生命的描述,也不可避免地要采用‘自我’这个术语。”^②

不难看出,约纳斯对生命体的内在同一性的强调与自创生理论对生命系统的自主性和主体性等特性的强调有明显的契合之处。不同之处在于,自创生理论对生命系统的主观性的探讨主要是在分子生物学的层次上进行的,从它的倡导者们反复使用“细菌的趋化性”的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而约纳斯更多地不同种类、不同等级的动植物个体(例如上文所说的“蜥蜴”)作为生命活动的主体。但这种分歧可以说只是“技术性的”,不足以掩盖二者在思想实质上的一致性。

四、目的性是生命系统与心智共同拥有的本质属性,是生命与心智的深度连续性的集中体现

在约纳斯看来,以上所说的形式同一性和自主性等特性还不足以充分刻画生命与非生命的本质区别。我们还必须看到,生命行为与非生命的物质过程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前者是有目的的。实际上,对约纳斯而言,我们不难从生命体所拥有的形式同一性、自主性和主体性等特性中进一步推导出它们的目的性。

约纳斯对生命的目的性的看法与康德的见解有很大的不同。在谈到如何才能揭开生命的奥秘的问题时,康德指出,“人类若期待有朝一日会出现另一位牛顿,能用自然定律解释哪怕一株小草的生成,都将是荒谬之举。”^③这就是说,人类无法以机械论解释有机自然,而必须采用目的论的概念。但康德同时强调目的论是观察者理解有机体的“调节性”概念。在对有机自然进行认识的过程中,我们固然需要将有机体视为具有目的性存在者,但这并不意味着目的性范畴表达了有机体的“存在论特征”。有机体可能只是在我们看来表现出目的性行为,这种描述方式仅是方法论上的权宜之计。简言之,“所谓内在目的性或许只是我们认知和考察方式的产物,而非有机体本身的固有特性。”^④

约纳斯认为,康德在生命的目的性问题上的上述这种过分保守的观点是由于他仍然深受客观主义的思维方式的束缚造成的。自笛卡尔提出心物二元论和心身平行论的主张以来,客观主义的思维方式一直大行其道,其思想根源在于人们缺乏对自己的身体及其自我感知在我们对世界万物

① Hans Jonas, *The Phenomenon of Life: Toward a Philosophical Biology*,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91.

② *Id.*, 82.

③ 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Judgment*, translated by Werner S. Pluhar,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87, pp. 282-283.

④ Paulo De Jesus, *Autopoietic Enactivism, Phenomenology and the Deep Continuity Between Life and Mind*, *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Vol. 15, No. 2, 2016, pp. 265-289.

的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为了彻底摆脱客观主义的思维方式的束缚,有必要从“人是万物的尺度”的高度重新认识我们自己的身体及其自我感知在对世界万物的认识中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约纳斯看来,对“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古老的信条,唯一正确的解读在于,对世界万物的认识应当参照我们本己身体活生生的体验来进行,而不应仅仅通过对客观事物的外在感知来进行。只有基于我们在本己身体的活动中体验到的力量及其作用,我们才能理解客观事物中存在的力和因果关系。同样的道理,只有基于我们在本己身体的活动中体验到的目的性,我们才能理解生命的内在目的性。正如约纳斯本人所指出的:“在这里,作为生命体,我们恰好拥有内部知识。在我们的身体所提供的直接证据的强力量的基础上,我们能够说出上帝作为无形体的旁观者无法说出的话:神圣数学家对世界的全方位的同质分析错过了一个关键的观点——即生命本身的观点:生命体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它为了自身存在,与世界上的其余一切处于对立之中,内部与外部对它来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①对于我们这些有血有肉的人来说,受内在一性支配的生命体及其新陈代谢过程具有外在的物理和化学过程不可能具有的目的性。这种目的性主要体现在:

首先,在自然中自发地涌现出来的生命奇迹在存在论上的奇特之处在于,“它们是由它们自己造成的,它们为它们自己存在,并通过它们自己维持自己的存在。”^②它们既是自身之因,又是自身之果。这意味着必须把生命看成一个以自身为目的、具有内在目的性的存在者。

其次,与像“波”这样的物理对象处于物我不分的状态不同,“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体能将自身与它物区别开来,并“关心”自己的存在与延续。它的新陈代谢过程仿佛是在某个主宰者的支配下进行的,而不是像波那样“无主的”。在被视为受到某个主宰者支配的情况下,生命的新陈代谢的连续性事实得以被理解为有目的的“自我延续”,生命体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得以被理解为在某个主宰者有目的的主动活动中自我整合的结果。

最后,生命体不是被动的物质,而是能对环境中的各个对象是有利还是有害主动进行区分并作出适应性调节的有目的的存在者。例如,细菌出于对自身生存的关切趋向营养物质或避开毒素的行为,显然是以维持自己的生存为目的的行为。

在约纳斯的影响下,韦伯和瓦雷拉在“康德之后的生命”^③一文中认为目的性并不如康德所主张的那样只是观察者理解有机体的调节性概念,而是生命自身的实在属性。例如,细胞代谢、免疫反应或动物的觅食行为,并非仅仅“看似”有目的,而是真正追求维持生命所需的东西。这种目的性并非外在地被赋予,而是植根于自创生系统的组织逻辑之中。简而言之,生命的存在方式本身即蕴含与“最低限度的主体性”相关联的内在目的性。

目的性通常被看作心智除“认知功能”之外的另一个重要特性。因此,对生命的内在目的性的揭示意味着目的性是生命与心智共同拥有的本质属性,从而使“生命与心智的深度连续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

五、结语

生命之为生命,在于它在与环境的物质和能量交换过程中具有通过趋利避害实现自我保存的能力,即能基于自我保存的需要对外界环境提供的东西进行取舍。如果我们把生命体基于其维持

^① Hans Jonas, *The Phenomenon of Life: Toward a Philosophical Biology*,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79.

^② *Id.*

^③ Andreas Weber & Francisco J. Varela, *Life after Kant: Natural Purposes and the Autopoietic Foundations of Biological Individuality*, *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Vol. 1, No. 2, 2002, p. 97-125.

自身延续的内在倾向和自我中心关切进行的这种取舍看作通过某种级别的心智实现的认知,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没有一定级别的心智及其认知,就没有生命的存在和延续。从细菌到动植物个体,任何一个生命系统都必然作为莱布尼茨所说的“单子”意义上的精神实体或“心智”存在,它们各自的生命活动本身就是一种认知活动。这就是“生命的心智性”或“生命与心智的深度连续性”。

如前所述,在心智和认知的本质问题上,汤普森等人倡导的具身动力论强调的是心智的具身性、生成性、嵌入性和延展性。那么,心智和认知是否能够脱离生命独立存在?抑或真正意义上的心智和认知仅仅存在于有机体有目的、有内在感受的生存活动中,而不能发生在大数据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 LLM)或其他各种类型的人工智能中? 4E 策略没有对这个问题做出正面回答。至少它并不认为,只有拥有内在的主观感受的心智才是真正的心智。“数字果蝇”^①的出现既进一步证实了 4E 策略的科学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心智可以脱离生命体以数字化的方式表现出来。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数字果蝇不像现实世界的真实的果蝇那样有饥饿之类的内在体验,因此前者的心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心智。

瓦雷拉的自创生理论和约纳斯的新陈代谢理论的关键之处在于认为生命是心智的充分条件——有生命者必定基于对自我保存的关心而体验到外界环境中的东西对它所具有的不同意义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他们顺理成章地得出生命即心智、生存即认知的结论。但在他们看来,这个命题的反命题——心智即生命、认知即生存——并不成立,因此他们恐怕不会认为“数字果蝇”是真正意义上的生命。尽管数字果蝇能够像生物果蝇一样自主地行走、觅食和梳理,但它既缺乏对自己的生存关心,也缺乏饥饿感、饱足感等内在体验。它能趋利避害,是因为环境信号触发了神经回路,而不是因为它“害怕”死亡,它复制了心智的功能,但缺失了生命最核心的目的。

综上所述,一方面,有生命者必定有主观体验,必定有一定程度的心智;另一方面,像数字果蝇这样的有心智者不一定有内在体验,不一定有生命。问题在于,后面这种徒有其表的、不包含内在感受的心智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心智? 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生命不仅像瓦雷拉和约纳斯等人已经看到的那样是心智的充分条件——生命即心智,生存即认知;而且同时必须看到生命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即包含内在感受的)心智的必要条件——只有有生命者才拥有真正意义上的心智,才拥有对感受质的体验,否则顶多只有像数字果蝇这样的僵尸式的无内在感受的心智。

(下转第 125 页)

^① “数字果蝇”指的是 2026 年 3 月 Eon Systems 公司取得的一项技术突破,他们成功地将一只果蝇的完整的大脑神经网络(连接组)数字化,并在虚拟物理环境中让它“活”了过来,自主地行走、觅食和梳理身体。

**Relational Labor and Its Operational Logic in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on Prosperity:
A Case Study of Chen Village in Southwestern Shanxi Province**

XU Hongyu

(School of Sociology,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124, China)

Abstract: Guided by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employment production not only optimize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models, but also strengthens rural social collaboration and consolidates rural governance foundations. Field research in Chen Village reveals that moral relations strengthen the employment structure, trust relations mitigate interest distribution while contractual relations shift toward local ethics. Accordingly, the agricultural labor process is embedded in this relational structure, with both employers and laborers relying on it, thus forming relational labor. Relational labor, based on the operationalization of relations, implicitly motivates labor, empowers governance practices, and promotes social equity, thus constituting a three-tier logic of “foundation-adaptation-consolidation” that supports common prosperity. The generation of relational labor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production and the nature of capital. Meanwhile,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relational labor should be guarded against, the relational constraints under oligarchic governance should be avoided, and an order balancing human feelings and interests in rural society should be constructed.

Key words: relational labor; labor process;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common prosperity

(责任编辑:魏 霄)

(上接第 11 页)

Philosophical Biology, Phenomenology of Life and “the Deep Continuity of Life and Mind”

ZHU Yaopi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oochow University, Jiangsu Suzhou 215123, China)

Abstract: The continuity between life and mind can be classified into “weak continuity” and “strong continuity”. The former emphasizes the inherent connection between mind and life, viewing the mind as an embodied subject that is alive and actively constructs the world. It considers cognition as a process through which living systems adapt to their environment and create a meaningful surrounding world for themselves. The latter, often referred to as the “deep continuity of life and mind”, focuses on the “mentality of life” rather than the “life-like nature of mind”. Varela’s theory of autopoiesis and Jonas’s phenomenology of life both, independently, regard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living systems, such as formal unity, openness, autonomy, and purposiveness, as manifestations of the “mentality of life” or the “deep continuity of life and mind”.

Key words: Varela; Jonas; autopoiesis; metabolism; the continuity of life and mind

(责任编辑:傅 游)